

雲夢文史資料

第四輯

政协云梦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政协云梦县文史资料

研究委员会名单:

主任: 汪应瑞

副主任: 郑星楚

委员: 熊银祥 张建中

盛智颐 陈怀安

封面题字: 郑星楚

封面设计: 张智来

篆刻: 普金城

编辑: 吴玉谦

赵永宽

黄为义

责任编辑: 胡卫刚

校对: 许树宗

文学小传	旧事	戎马	春秋	坛政	宿	林	儒	林芳	杏林	岸思	两情	亥遗	辛拾
我跋涉在诗路上	彭克定先生事略	八·一三抗战时的彭克定上校 我所见到的彭克定先生	我任云梦县长前后的片断回忆 「绿衣信使变财神」 旧邮界闻人许季珂生平纪要	我所见到的许季珂先生	缅怀先父戴辛曾博士 一生尽瘁于中学教育事业的李辉祖先生 怀念李辉祖校长	先父熊卓轩先生生平事略	教育台柱 抗日志士 张天健先生生平简迹	忆先君方舜卿先生 忆老中医孙春武先生	郭济生小传(附诗选)	张昉先生事略	先父吴承鼎一生的经历		
晏明(一)	胡卫刚整理(一八)	曹 璠(三〇) 陈 列(三三)	钟济民(三六)	梁 言(五三) 曹 璠(五八)	戴幼曾(六〇) 熊培庚(六七) 孙自谦(七二) 熊培庚(七五)	邹存宽(八五) 方郁文(九一) 谢蔚腾(九五)	郭济生(一〇〇)	罗树勇(一〇四)	吴家驹(一〇六)				

云梦文史资料

第四辑

(人物专辑)

附 录	云 风	梦 物	艺 搬	苑 贝	大 革 命 风 云 录
政协云梦县第二届委员会增聘人员名单 (一九四)	政协云梦县第二届委员会增聘人员名单 (一九二)	漫说云梦「府布」 话说祖祠殿 云梦「三月三」 (一九三)	张树滋先生传略 我的皮影生涯 (一六四)	戴雨生(一二六) 周洪祥(一三四) 左金荣(一三六) 汪雁北(一四二) 邹依华(一四九) 王瑞阶(一五六)	我在大革命前后的经历 朱道平口述 尹驰名整理(一一〇) 为革命事业作过奉献的人 记吴友柏先生 我所认识的吴友柏先生 我任云梦县妇协会长的前后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胡金店的社团组织 大革命时期魏店农民运动断忆 生祭陈恩普先生

我跋涉在诗路上

【文学小传】

晏 明



诗的播种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我出生在湖北云梦平原。我的故乡云梦北乡郭家墩，一个二十几户的小村庄。后来，我家迁到东乡小镇李家店。

我原名郭祥邨，又名郭灿、郭灿之。祖父郭树森，辍耕学儒，学有专长，清末民初曾游鲁、燕、豫、鄂，代荆门知县。后在李家店建起房屋。我的生父郭济生，又名醉僧（这可能是他的“人生哲学”）。他自幼刻苦自学，青年时期长年漂泊异乡，先在云梦县城中心小学任教，后在河南郾城、开封任教，并曾任报社编辑、记者、总编辑、社长等职。从事写作，经常失业。在他中年时入军界从事政治文化工作。伯父郭奎生无子女，我幼年时过继伯父母为子。继父青少年时期入私塾攻读，擅长诗词、书法；一生热诚待人，乐于助人，受到邻里钦敬，曾经营商业，晚年开门办学。伯母为人精明，但不够宽厚。我的生母亲晏桂枝，是承担全家劳动的仆人，她出身书香

门第。外祖父晏斗书，湖北孝感人，是私塾教师，中青年时期，从事革命活动，曾与董老必武交往。大舅父晏瑞生，二舅父晏萌生，中青年时期均参加革命活动，与当地反动势力势不两立。三舅父晏炎生是革命烈士。母亲秉性勤劳，刚直，我们兄弟姐妹受她的影响很大。我是在母亲的纺车边长大的，她经常在桐油灯下教我唱儿歌，那些故乡的儿歌，启发我喜欢歌谣，直到后来执著地喜爱新诗。为了纪念生我养我的在贫病中死去的母亲，我开始写作时，就以“晏明”为笔名。我的弟弟郭村四十年代后期曾任郑州《正义日报》记者，后随父去台湾任教，有诗作发表。妹妹郭剑华系台湾画家，曾赴日本三次举行个人画展……

我七、八岁时，在李家店杨静斋先生的私塾上学。十岁时，随父亲到河南郾城上小学。他擅长国画，他年轻时曾画过一幅一百种姿态麻雀的《百雀图》，气韵生动，栩栩如生。他写小说、诗词，也写新诗，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他对我要求严格，经常要我背诵诗词，背诵外国文学作品，用文学语言写日记……由于家境困难，我上学，失学；又上学，又失学。失学时，我读完我国几部古典文学名著和几部武侠小说，也读了鲁迅、茅盾和巴金的小说，郭沫若的诗。我开始接近新文学。以后，我又阅读了大量我国“五四”以来的文学作品和苏联文学作品。

神圣的抗日战争爆发了！当时，我是孝感县启浪中学初中三年级学生（我也曾在安陆中学上学。那时，云梦县连一所中学也没有）。抗日的烈火鼓舞我，我狂热地投入如火如荼的抗日宣传活动中。在启浪中学，我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和学生抗日宣传队长。到街头去，到农村去，到集市去，写标语、画漫画、演街头剧、演话剧……寒暑假，我到云梦县城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同县城的学生们（大部分在武汉、安陆上中学）一起演话剧，县城中心小学和培英小学的学生们表演歌舞。演出地点在城隍庙的戏楼上，庙里挤满了观众，演出进入高潮时，台上台下一起高呼抗日口号。我们还打

着为前方将士募捐的小旗，到富户人家去募捐，连鸦片烟馆也闯进去。他们不捐钱，我们就不走，连我家有钱的亲友也不放过……

一九三八年春，我离开家乡到武汉去寻找出路。我的出路在哪里？我感到茫然。武汉沦陷的前两月，我怀着憧憬和求生的热望，含着泪水告别家乡，随一个军队剧团到湘西、黔东、川南去。我走上布满荆棘的人生道路，漫长而坎坷的道路。我不相信命运，但命运不断地揶揄我，袭击我。要生活下去，就必须与之搏斗；而搏斗的结局，往往以我败北而暂时告终。呵！人生……

诗的萌芽

一九三八年冬，剧团在湖南常德、桃源、沅陵演出。剧团由进步力量控制，全部演出抗日和进步话剧。一九三九年春，在沅陵演出后，我们步行到芷江和贵州镇远。夏初，我们到了贵阳，主要演出著名剧作家阳翰笙的四幕历史话剧《李秀成之死》（以团结抗敌为主题），我在剧中扮演一个普通角色蒋老爹。平日除排练外，我几乎每天到贵州省立图书馆去，每周到生活书店去。我成了书迷，如饥似渴地读书，理论、哲学、文学。书，打开了我的思想，给我以智慧和力量。我开始写作，写剧本，写诗。秋天，我们到了革命名城遵义。我们给抗日前线的八路军写了大批慰问信。

这是我走向文学、走向诗的起点，山城贵阳和遵义是我开始孕育诗的摇篮，是我走向诗的道路的起点……

第一次发表诗

一九三九年冬，我们到了重庆。《李秀成之死》，一次轰动重庆的演出，由全国著名导演洪深、史东山、应云卫、陈鲤庭、

王瑞麟、何非光等人组成导演团，马彦祥担任执行导演，阳翰笙亲临指导，进步戏剧界的一次大动员。我认识了一些进步戏剧家。我继续读书，写诗，常到中苏文化协会阅览室和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去，读了更多的俄罗斯文学、苏联文学作品。我时时思念我的故乡，故乡在日寇铁蹄下呻吟。

一九四〇年三月，我写了《涸水之春》，一首思念故乡的诗，寄给著名作家靳以主编的重庆国民公报文艺副刊《文群》，不出半月，我接到靳以老师热情鼓励我的回信。四月，《涸水之春》发表了，这是我第一次发表诗。我常常以感激的心情回忆、怀念在六十年代病逝的靳以老师——我在文学上的第一个引路人。

从重庆到桂林

从桂林到重庆

一九四〇年夏，我从重庆经宜昌、长沙去桂林。在长沙旅次，我看到衡阳大刚报文艺副刊《阵地》，编得很进步，很吸引人。我从长沙寄去一首诗。我到桂林不久，接到《阵地》主编、诗人王晨牧的热情回信，说诗即发表，并盼我经常寄稿。在以后的几年中，我经常在《阵地》发表作品。

在桂林，我有一个糊口的职业——在一家官办报纸当夜班新闻编辑。我夜晚编报，白天读书、写诗。我经常发牢骚、骂大街，诅咒他们和属于他们的那个世界。干了半年，我被革职了。这是我第二次失业。为了糊口，要我“屏息低头”，是不可能的！我是“活在可诅咒的地方了”（鲁迅语），我必须诅咒！

在桂林生活了大半年，我认识和接近了一些进步作家、诗人聂绀弩、彭燕郊、韩北屏、黄宁婴、陈芦荻……写了许多诗，发

表在桂林、衡阳、香港、吉安、重庆、成都等地报刊。

一九四一年二月，我在朋友的帮助下，返回重庆，又在一家官办报纸得到一个糊口的夜班新闻编辑的职业。由于我继续诅咒他们和属于他们的世界，又干了半年，我又被革职了。短暂的历史也会重演！连我的女友北野（报社的校对，我以后的妻子）也受到株连。他们接二连三剥夺我的温饱权利，但我必须生存下去，而且必须发展！发展我的文学事业，发展我的诗。这是不可剥夺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创办《诗丛》诗刊

一九四一年秋，我又一次失业后，住进几个朋友合办的小印刷厂，暂时在那里跑外勤，当校对。我依旧读书，依旧狂热地写诗。诗友菲北和挚友北野，都发表过诗、散文诗。我们三人经常谈起：办一个诗刊。经费来源：一是想法找朋友自筹部分资金，二是广告费，三是取得印刷厂帮助，先付一半印刷费，得到书店书款后付另一半。办刊宗旨：在抗日战争旗帜下，团结诗人群，以青年诗人为主，以青年读者为对象；园地公开，没有宗派、门户之见，发表以讴歌抗日战争和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发表各种题材、风格、流派的作品。诗刊由我定名为《诗丛》，由我担任发行人兼主编。我们办刊的主导思想：要办好诗刊，必须依靠进步力量，依靠进步文艺界。诗刊筹备工作开始后，我投入了紧张的组稿活动。当时活跃在重庆文艺界的进步诗人、作家们，大部分成了我的组稿对象，成了我的朋友。其中与我年岁相近的青年诗人沙鸥，成为我的好友（后来知道，他是一九三八年的中共地下党员，在重庆搞学生运动，兼搞文学创作）。他是我四十年代初期接近的第一个中共地下党同志。

《诗丛》经过几个月艰辛筹备，于一九四二年三月出版创刊

号，五月出版第二期。发表了一些著名诗人和青年诗人的作品和评论、译诗，由中共南方局领导的重庆生活书店总经售。

由于我长时间处于失业的困境，加上刊物经费等问题，《诗丛》不能继续办下去。而恰恰在这时，我需要建立人生旅程中的重要驿站——家庭，不能再留在重庆了。

在鄂中抗日前线

在鄂中长江北岸江陵一带，当时的第六战区的地方部队，办了一张四开小报《胜利报》，我应约去编报，编辑、记者一身兼。我和北野结婚后，一同前往，她住长江南岸麻河口。这使我有机会深入到前线部队和农村生活中去。被称为“杂牌军”的地方部队，在与日寇、汪伪军的战斗中多次取得胜利，曾为俘获一名日本兵而大开庆祝会。我在《胜利报》上为这些战斗与胜利大唱赞歌。我在前线的大半年时间，搜集了很多写作素材，以“战地诗草”为副题，先后写了五十余首反映前线抗日生活的抒情诗，陆续发表在桂林《诗创作》和大后方各地报刊。有一次，日寇半夜发起攻势，我单人独骑去找司令部，一进村，发现无哨兵，村外枪声密集。一位好心的老农焦急地喊：“赶快调头出村，日本兵快进村了！”我一边道谢，一边调过马头，加鞭飞奔出村，敌人的子弹从我背后射来……

从鄂中前线到

鄂西恩施

这支地方部队，在日寇的强力“扫荡”下，溃散了。

我和北野，还有出生三个月的大女儿，在战火纷飞中重又团聚。我们在鄂中松滋、公安和鄂西巴东流浪两个多月。一九四三

年五月，我到了鄂西恩施，由新闻界友人介绍，到武汉日报主编文艺副刊《鸚鵡洲》（每周出刊六期）。同办《诗丛》的主导思想一样：要编好文艺副刊，必须依靠进步力量。我大力向当地和重庆等地进步作家、诗人和进步青年作者（主要是重庆各大学的进步学生）组稿。我力求在副刊内容上保持前任主编韩劲风（中共地下党员）的战斗风格。我在武汉日报的工作，得到中共地下党同志和进步作家、诗人们的热情支持。我已经能够独立作战，编辑一家大报的副刊。在进步人士新湖北日报总编辑夏晨中和新湖北日报鄂中分社社长谢蔚明的支持下，我先后在这两家报纸副刊上编辑、出刊了《诗丛》恩施版（并排印成单行本发行）和《诗丛》鄂中版。由于工作需要，我写了较多的反映现实生活的诗、散文和评论，以及抨击时弊的杂文等，凡是副刊所缺少和需要的，我都写。有时版面缺稿，自己立刻动笔赶写。编报纸副刊、编《诗丛》，写诗、写文章，这对我确是一种很好的锻炼，使我这个青年编者、作者（当时二十三、四岁），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得到提高，学会战斗，逐渐走向成熟。

复刊《诗丛》重庆版

一九四四年冬，诗友沙鸥从重庆来信：计划筹办《文学月刊》，约我去渝合作。编报纸副刊只不过是职业，而自己办文学刊物是事业。经与北野反复商量，为了文学事业，我让妻女及待产的婴儿暂留恩施。我于这年年底只身先去重庆。年轻人总是富于憧憬和理想的，为了事业，我可以作出牺牲。我到重庆后，经过酝酿，筹办文学月刊的经费仍是问题。当时正值湘桂撤退，东南的失业作家、文化人集中重庆，我的职业同样难于解决。后来，我们决定恢复《诗丛》诗刊，我和沙鸥曾访问诗人甘永柏（甘祠森），他是中共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的《中国学生导报》

发行人（三十年代初的中共地下党员）。我们请他帮助解决《诗丛》的经费问题，永柏同志向上级请示后，认为难办的仍是经费问题。

《诗丛》在许多青年诗人的支持下，用征集社友凑集经费的办法，初步解决了印刷费。这时，我积极参加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以郭沫若同志为首的进步文艺界的各项活动，可以听到党的声音。我认识了更多的知名进步作家、诗人。《诗丛》第二卷第一期（总第七号，歌谣特辑，十六开本），在诗友们热情支持下出版了，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读书生活出版社总经售。这一期，大部分篇幅是有影响的诗人、作家的作品、评论、译诗等。

依旧是刊物经费问题，依旧是我的职业加上四口之家的生活问题。偌大一个重庆，竟然没有我立足之地！每当我想到北野和儿女远在恩施，过着无米下锅的日子，就心如刀割……一个深夜，我久久坐在长江边的悬崖上。我走上了生活的绝境，一个闪念，我几乎从悬崖跳下去……朋友们早发现我情绪反常，深夜不归，跑到江边呼喊寻找我来了。我从恶梦中醒来，依旧是恶梦，依旧是悬崖……依旧是又一次离开重庆。由朋友的朋友介绍到四川铜梁一家小报《铜梁民报》去当编辑。三个月后，日本法西斯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了！这家小报也宣告停刊。妻子儿女从恩施来到铜梁，一同过着继续失业的生活……

创作上的新起点

两个月后，经过多方奔走，由一个亲戚的朋友介绍我到四川潼南机械化学校编校刊，又一个糊口的职业。后来，因我拒绝发表一篇反动文章而被革职，不得不到这个学校所属的基层单位做所谓的新闻工作，实际上我是不做任何工作的……我寂寞、苦闷，有时愤怒，只有提起笔来，才能稍稍排遣我的寂寞与苦闷，才能抒发我的愤怒！我经常收到一些诗人、作家朋友的热情来

信，安慰我，鼓励我继续写作。

一九四六年春，在中共上海地下党青委领导下，老友李凌、薛汕、沙鸥在上海编辑出版《新诗歌》（月刊），沙鸥任主编，我受到老友们的热情关心。沙鸥经常来信，每信必嘱我写诗、寄稿，并在题材上给我以启发，谈到写什么、为什么人而写？就在这时，我加强了与中共地下党的联系，并接受任务，沙鸥同志是我的联系人。我们在重庆时约定了一些通信暗语，以防不测……

摧枯拉朽的解放战争开始了！在新的革命形势鼓舞下，在老友的督促下，我在创作上开始了新的起点。这个时期，我主要写政治抒情诗和小叙事诗，揭露反动统治，抨击时弊，反映农民疾苦和农民反抗征兵、征粮……《新诗歌》几乎每期发表我的作品。各地进步报刊《大公报》文艺副刊、《诗激流》、《海燕》、《诗创造》、《诗垒》等，发表了我不少作品。蒋家王朝的丧钟已经敲响。我在创作上虽然向前迈进了一步，但同党直接领导下的解放战争和革命斗争比较起来，显得多么微弱、渺小！……

一九四七年春，在沙鸥的关心下，编辑了我的第一本诗集《三月的夜》，选辑了我四十年代初期、中期的诗作，《新诗歌》刊出了广告。

在阳光下歌唱

一九四九年，十月的阳光普照大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崭新的时代，需要崭新的诗。

在边远的湖南南部小城郴州，我接到沙鸥同志从北京拍来的电报：速来北京。一九五〇年夏，我从南方来到首都北京，开始了新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是由党组织安排的。我和北野都在北京新民报任副刊编辑，我兼任新中国第一个诗刊《大众诗歌》（月刊）编委和执行编辑。老友王亚平任北京新民报中共党组书记兼总编辑，沙鸥任副总编辑兼中共党组副书记。老友们又欢聚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抗

美援朝开始后，我们又编辑、出版了《诗·歌·画》（月刊）。我热情地不知疲倦地投入工作和创作，夜以继日。我写了大量的诗，为新中国歌唱，为抗美援朝歌唱。许多抒情短诗和两首叙事长诗发表在北京、上海等地的报刊。我加入了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和北京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做了一些工作。

重庆，我回来了！

一九五一年五月，北京市文联党组上报批准我参加中央土地工作团，到四川去进行土地改革，我又一次来到重庆，那阴云笼罩、痛苦流浪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重庆，我回来了！到实际斗争中去锻炼，对我是多么需要！我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被分配到川北土改工作团。到达南充时，川北行署主任胡耀邦同志热情地接待我们。土改，是反封建、反剥削的壮丽史诗，是激动人心的。四个月飞快逝去，我经历了土改的全过程，受到了教育和锻炼。回到北京后，我很快写了三十多篇《土改散记》，热情赞颂了这场贫苦农民翻身的惊天动地的斗争，陆续发表在新民报《萌芽》副刊。

我热情关心、扶持青年作者，刘绍棠、从维熙、刘厚明、韩映山、房树民、任彦芳、苑纪玖、李学鳌、温承训、韩忆萍等作家、诗人最早的作品，多由我经手发出。

从写不出到“大跃进”

一九五二年一月，我和北野被调到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参加党报的筹备、试版工作。我编副刊，她任市政组记者。调动前，亚平（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兼秘书长）曾恳切表示调我到文联工作，让我下工厂生活，专心从事创作。我两次向报社提出要求去文联，报社强调党报工作需要，未同意，我服从了组

织调动。由于工作繁忙和种种“左”的影响，将近三年，我很少写作，写了也不愿寄出发表。作为一个诗作者，我似乎被遗忘了……对待工作，我十分勤奋、积极，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写作被荒芜了，写作的“田园”是歉收的。尽管写作完全在业余时间进行，却很难得到报社有关负责人的关心、支持，实际上是在自生自灭的情况下进行写作……

一九五三年，我编选了诗集《收割的日子》，由北京自强书局出版，这是一本赞颂新中国和支持抗美援朝的集子，这些诗都是用自由体形式写的。

一九五七年初，我被调到新成立不久的北京出版社，负责文艺创作和评论编辑工作。先后编选了《北京的诗》、《十月颂歌》、《北京工人诗百首》、《十三陵水库》、《大跃进之歌》、《北京新民歌选》等诗选集，分别由陈毅、郭沫若、臧克家、冯至、张光年写序。以后陆续编辑、出版了郭沫若、夏衍、巴人、臧克家、曹禺、周立波、田间、刘白羽、郭小川、徐迟等十二位作家的文集和中青年作家、工人诗人和作者的小说集、诗集二百余种。

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七年的两次政治风浪，无例外地触及我，审查我，总算平安度过。我的创作情绪逐渐好转，在新形势鼓舞下，我又写得多了起来，仿佛在“大跃进”。我是紧跟形势的，和平、东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兴水利……我都写过。由于一种不可弥补的不足，许多诗不能留存下来。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十年时间，我经常写一些国际题材的组诗、长诗，大部分发表在《人民日报》。我关注国际上所发生的一切，热情支持反帝、反殖、反种族歧视……

一九五九年，我编选了诗集《北京抒情诗》，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选辑了我在一九五三年——一九五九年间各地报刊发表的作品，以赞美北京和国际题材的诗为主。

六十年代初，自然灾害袭击着我们的国土，我也被疾病所袭

击，住过疗养院，但仍继续写作。这时，我开始改变我的洋洋洒洒的自由体诗风。我努力把诗写得凝炼些，精美些，我开始在诗的美学上有所追求。我阅读大量的唐人绝句，折服于我国古典诗歌艺术的光辉成就，并从中吸吮营养。我也向外国各种流派学习，阅读我可以搜集到的外国诗集。

一九六六年初，我选编了诗集《欢歌》，选自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五年间，我所发表的诗作（主要以劳动人民和先进人物为题材），寄上海文艺出版社。他们审定后列入计划，准备出版，浩劫开始后，这本诗集被冲掉了。

从五十年代初至今，我陆续写了一些评论，主要是谈诗、谈创作，为数不多，散发各地报刊。我想过两年编一本自己的评论集。

春天，创作的旺盛期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开始了！祖国和人民陷入苦难之中。祖国，滴着血，我被剥夺了工作和做人的权利，被迫停止工作，住牛棚，受审查，被批判，下放插队劳动……经历了浩劫的全过程。我曾发誓不再写作，这实质上是对“四人帮”的诅咒。任何倒行逆施，是不能持久的！一九七六年十月，万恶的“四人帮”被粉碎了！新时期来临了，文学创作的春天到了！

一九七八年夏，在老友、音乐理论家李凌的关心下，中央乐团从我下放劳动的京郊昌平县借调我写作大型声乐作品的歌词：《刑场上的婚礼》（清唱剧）、《风暴》（大合唱），以及抒情独唱曲歌词，同作曲家王树、张文纲、王酩合作，由中央乐团合唱团和歌唱家罗天婵、刘秉义、傅海燕等演唱。其中《一三五七八》（讽刺歌曲），曾获文化部建国三十周年文艺汇演创作奖。

一九七八年冬，我重返工作岗位，参加《十月》杂志编辑工作，负责诗、散文、报告文学。

从一九七八年秋至今，由于工作需要，我几乎走遍山海关以南的主要大中城市和祖国西部几个省。祖国，我的辽阔的壮丽的祖国，大自然景观，绚丽多彩。我为祖国的名川大山而骄傲，我为祖国富饶的大地而自豪！从一九七九年初开始，我致力于新山水诗的写作。八年来，我在祖国各地报刊发表了大量的赞美祖国山山水水的诗。我努力把祖国壮丽的美和我对祖国深沉的爱，倾注于诗的形象与意境、乐感与色彩之中。假如，我有一千双手，我就同时用一千支笔赞美我的祖国，描绘祖国的山山水水。新时期，我的创作旺盛期，产量之多，发表作品之多，是前所未有的。花甲之年，成为我创作的青春期。呵，青春，返回我曾经结冰的心中……

一九七九年，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一九八〇年，我被选为北京作家协会诗歌组长。一九八一年，我被选为北京作家协会诗歌散文创作委员会主任，被聘为中国音乐学院创作研究室特约研究员。后来，在北京出版社评了高级职称编审。

我登上祖国第一名山

一九八二年夏初，我登上了祖国第一名山——黄山。回北京后，我陆续在各报刊发表三十多首黄山诗。其中一组《黄山，奇美的山》（五首），发表在香港新晚报，由香港著名作曲家屈文中谱成大型声乐作品大合唱诗篇。一九八三年七月，由台湾成明合唱团在台北孙中山纪念馆大会堂首演，受到台胞的热烈欢迎。后在台湾、香港多次演出，由台湾福茂唱片公司录制成唱片和盒式磁带，在台湾、香港和日本、东南亚各国，以及美国部分城市发行，受到广泛好评，并获得台湾优秀作曲金鼎奖、优秀唱

片金鼎奖。我的黄山诗是不足道的，能借音乐的翅膀飞往台湾，让台湾同胞和骨肉亲人听到来自黄山的歌声，我深深感到欣慰……

一九八三年，我出版了诗集《故乡的栀子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春天的竖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的两本山水诗集。我深情地赞美我的祖国，深情地赞美抚育我成长的故乡和故乡人民，深情地怀念我慈爱的母亲，我一边流着泪，一边写这些诗。

感谢老诗人、作家、评论家臧克家、公木、端木蕻良、沙鸥、彭燕郊、公刘、秦牧、唐湜等同志以及晓雪、任愫、杨匡汉、刘士杰、宋家玲、张同吾、张建设、冉庄、郑帆、华杉、赵强、丁慨然等中青年诗人、诗评家，为我的诗写了评论，发表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文学报》、《北京文学》、《诗刊》、《文汇报》、《诗歌报》、《诗神》、《艺谭》等报刊。吉林大学副校长、著名理论家、老诗人公木同志，给了我热情的鼓励，将我九首八行诗，译成七言绝句，这是文学史上的第一次。三十多年来，全国各地约有四十余种诗选集编选了我的诗作。苏联、朝鲜、美国、法国、日本、意大利、瑞典、西德、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新西兰等十余国家翻译、发表了 my 诗作。《中国文学家辞典》、《中国诗歌大辞典》等多种辞典，入选有关我的条目。

二上黄山，访问香港

一九八五年九月，我应中央电视台之约，二上黄山，拍摄有关我的《诗乐合璧黄山情》电视艺术片，于一九八六年一月一日和三月四日向全国播映。

一九八五年十月，我应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之约，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十五人组成，团长艾芜同志）访问香港，与香港诗人、作家进行创作、学术交流，座谈、访问、参观。这次访问，我会晤了